
拉丁美洲的民族国家构建

[编者按] 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出现,是近代以来世界各个地区一段共有的历史。无论在美洲、欧洲还是亚洲,民族国家对传统国家或王朝国家的替代成了新时代人类国家形态发展的一条主线,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单位。虽然中国学界也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这一议题,但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欧美与中东地区,对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较为缺乏。^① 这种情形,一来不利于知识的全面积累;二来也与拉丁美洲民族国家构建在人类历史的研究进程中的重要性不甚相符。

实际上,作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笔下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比亚非国家早了近一个世纪;此外,与欧洲单一白人条件下民族国家构建的历程不同,族群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拉美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也相当突出。上述先在性与特殊性,使得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构建对后续相关问题的研究构成了重要的意义。

基于上述思考,本次组稿邀请了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学从事拉美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就该地区的民族构建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在促进该议题跨学科与跨地区之间讨论的同时,也借着拉丁美洲的地区经验,让中国学界对“民族国家”的概念内涵有一些更为多元化的认识。

西属美洲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三重挑战： 原住民、移民与邻居(1850—1930)

张 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拉丁美洲克里奥尔人精英的言辞举措当作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浪潮。^② 他认为正是在这一波浪潮中,原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少数精英开始有了与欧洲人不一样的身份认同与政治诉求,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战争与谈判,在19世纪中期建立了一众新兴的西语民族国家。^③

1850年前后,虽然上述西语国家的地理版图已大致划定,宪法与配套的行政体制也已基本确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民族国家的构建业已完成。由于西属美洲独立战争与后续新兴民族国家

^① 目前拉丁美洲方面有关民族国家构建的研究包括韩琦:《加米奥的锻造祖国与墨西哥的土著主义运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夏婷婷:《19世纪末20世纪初阿根廷肺结核病的防治与民族国家构建》,《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张琨:《“上帝”与“祖国”——试论阿根廷天主教在民族构建中的作用(1890—1930)》,《世界宗教研究》2020年第1期;张青仁:《20世纪墨西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杜娟:《弃中取日: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的转变》,《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等。

^②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48页。

^③ John Lynch, *The Spanish American Revolution (1808—1826)*,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6.

的建立总体来说是由少部分克里奥尔人精英发动并主导的,因此当时西属美洲居大多数的其他群体——原住民、黑人以及绝大多数的混血人种——其实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参与不深。^①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明白也不在意阿根廷、秘鲁、智利与乌拉圭这一个个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不用说将其看作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本尼迪克特笔下对“共同体”的“想象”,在19世纪前半期的西属美洲,实际上只属于少数人。

但与“想象”所属群体狭窄相矛盾的是,如果这批克里奥尔人精英想要沿着欧洲的步伐,将“野蛮”与“落后”的新大陆逐步建设为“先进的”现代民族国家,那么他们就需要尽可能地发动他们所一贯歧视之族群的力量,将这原本只属于少数人的“想象”,转变成多数人所认同的“现实”。简而言之,拉美新兴民族国家的精英们,需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并接受新兴民族国家的身份,且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在的凝聚力,才能逐步地实现自己“建设何种国家”的宏图。而19世纪中期拉美多个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只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开端。

19世纪中期拉美不同新兴民族国家中精英对“先进国家”的特质具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比如国民应以欧洲白人为主,政体应为民主宪政。但由于各地原有历史条件的差异,各个新兴民族国家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却有所不同。自20世纪中期以来,拉美的一批学者基于安德森“文化建构论”的视角,对各自国家成立初期在民族构建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做出的努力进行了梳理与分析,诞生了不少佳作。^② 然而这种以国别为界的研究,在强调各个新兴民族国家特性的同时,却较少有联系比较,忽略了这些国家在从总督区的分属地区转变为新兴国家过程中所分享的诸多文化、传统和历史事件方面的共性与联系,从而阻碍了对“西属美洲”(殖民地)向“西语美洲”(民族国家)转变的整体性理解。^③

如果我们以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头30年的秘鲁、阿根廷与乌拉圭为例,综合拉美西语国家进行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便能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拉丁美洲西语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是一种由国家精英主导的,对自我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这一塑造将“自我”区别于“他者”,通过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分离出不同于“自我”的“他者”,来缩小并确定“阿根廷”“秘鲁”“乌拉圭”这一个个新兴民族国家的实质内涵。其次,自19世纪中期开始,上述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通过应对以下三种挑战,来逐步界定“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即原住民、外来移民与邻国。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这三重挑战在不同时段所占据的重要性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国家关键时期“民族国家构建”的内涵实际是有差异的,比如秘鲁的“民族国家构建”主要在于处理原住民问题,阿根廷则更多是应对大规模的欧洲移民,而对于乌拉圭来说,其最重要的则是处理与邻国阿根廷之间的关系。

19世纪中期,西属美洲独立战争业已结束。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两边的利马总督区和拉普拉塔河总督区已逐步演化为秘鲁、阿根廷与乌拉圭等国。这三个国家在建国初期,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原住民的问题,其中以秘鲁的经验最为典型。在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秘鲁克里奥尔人精英认为印第安人在体格和能力上有着“先天的劣势”,无法胜任任何体面的工作。^④ 这一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观念并非仅仅局限于统治阶层,而是通过宣传与灌输传播到了社会中。秘鲁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洛伦特(Sebastian Lorente)便对印第安人百般贬低,说他们“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只是会说话的大羊驼”。^⑤ 除去人种方面的蔑视外,克里奥尔人对17世纪以来

① Heraclio Bonilla, *Metáfora y Realidad de la Independencia en el Perú*,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16, pp. 71—73.

② 秘鲁的阿尔贝托·加林多(Alberto Galindo)与塞莉西·门德斯(Celicia Mendez)将原住民作为秘鲁民族构建中的关键问题;阿根廷的莉莉娅·贝尔托尼(Lilia Bertoni)则指出1880年至1920年大规模欧洲移民对阿根廷民族构建所带来的冲击;智利的豪尔赫·拉郎因(Jorge Larraín)更是将民族构建视为一个“一直在路上”的历史进程,认为其民族构建延续到了今日。正是在上述著作的基础上,人们得以对拉丁美洲多国在最为关键时段的民族构建的实质有所了解。

③ 这里的“西属美洲”强调了殖民时期该地区与宗主国西班牙之间的依附性联系,而“西语美洲”则暗示了在独立之后该地区与西班牙之间仅存的文化语言关联。之所以不用“拉丁美洲”,是因为本文的分析不包含葡语国家巴西。

④ Heraclio Bonilla, *Metáfora y Realidad de la Independencia en el Perú*, pp. 41—45.

⑤ Alberto Flores Galindo, *Buscando un Inca: Identidad y Utopía en los Andes* (Tercera Edición), Lima: Editorial Horizonte, 1988, p. 228.

安第斯山脉数以百计的印第安人起义与“重返印加”的乌托邦口号依旧有着不好的记忆,这也使得他们对这一族群充满着戒心。^①

出于上述原因,面对原住民问题,建国后利马精英选择了漠视与排除的解决方案。他们将国家的发展重心放在了以利马为中心的沿海地区,通过引进部分黑奴和大量华工来发展当时位于秘鲁沿海区域的糖业与鸟粪开采,并将公民的身份仅仅赋予沿海地区的克里奥尔人。^②在绝大部分精英们看来,能够代表此时秘鲁“民族特性”的只包含自伊比利亚半岛传播而来的欧洲文明,秘鲁应该努力以此为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内核,并通过向欧洲学习来完成民族国家构建。^③这一选择,相当于一开始将占人口大多数的、位于广大安第斯山脉区域的原住民排除在了民族国家构建的蓝图之外,使得广大的原住民对秘鲁这个国家后续的命运毫不关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续秘鲁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利。^④1888年,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Manuel Gonzalez Prada)便对“白人建国”的理念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忽略了秘鲁真正的建国之源,只能构建出一种“病态的社会”。^⑤冈萨雷斯认为“真正的秘鲁”(Verdadero Perú)是:“与住在太平洋和安第斯山脉之间狭长地带的克里奥尔人和外国人”相对的“居住在安第斯山脉中的印第安大众”,“只有这批人的加入”,将印加文化融入“秘鲁民族性”(Peruanidad)之中,才能建设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民族国家。^⑥冈萨雷斯的思考代表了秘鲁对于民族构建思考的一个关键性转向,影响了后续秘鲁众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之后的路易斯·瓦尔卡塞尔(Luis Valcárcel)、何塞·马利亚特吉(José Mariátegui)与维克托·贝朗德(Victor Belaunde)都曾就该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解决方案。^⑦

与秘鲁精英相比,位于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精英虽然也赞同“白人立国”的思想规划,但达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手段和结果则与秘鲁相异。^⑧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通过延续几十年的大规模的领土扩张运动,阿根廷精英以残酷的暴力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有关原住民的问题。1833年,罗萨斯发动了第一次“荒漠远征”,夺取了约300万公顷土地,1877年,罗加则发动了第二次“荒漠远征”,彻底击败了内閣罗河(Rio Negro)以北广大的原住民,并俘虏残杀了近2万名原住民。自此之后,原住民问题便从阿根廷的民族构建进程中逐步消失了。

将原住民削减排挤到阿根廷的政治与社会边缘并不意味着阿根廷的民族国家构建就再无挑战。相反,随着大量农业用地的成功获取以及英国工业革命对原材料的需求,阿根廷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为增加,而这一需求则需通过吸引大量的外来移民来解决。^⑨从1880年到1930年间,大约有400万的欧洲移民来到了高速发展中的阿根廷,其数量几乎占阿根廷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⑩短

① Alberto Flores Galindo, *Buscando un Inca: Identidad y Utopía en los Andes*, pp. 100—102.

② Rolando Rojas, *La República Imaginada, Representaciones Culturales y Discursos Políticos en la Época de la Independencia*, Lima: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2017, pp. 33—35.

③ 比如这一时期秘鲁的知识分子代表,里卡多·帕尔马(Ricardo Palma)就曾表示:秘鲁国民性的根基在沿海的利马,而非安第斯山的库斯科。克里奥尔人及其文化是秘鲁国民性的根本,印第安人在其中只占据着不重要的位置,他们的文化与语言一定程度上还是秘鲁现代化的障碍。参见 Ricardo Palma, *Tradiciones Peruanas*, Maison Carrée, 2016, p. 47.

④ José Luis Rénique, *Incendiar la Pradera, Un Ensayo sobre la Revolución en el Perú*, Lima: La Siniestra Ensayos, 2015, p. 21.

⑤ José Luis Rénique, *Incendiar la Pradera, Un Ensayo sobre la Revolución en el Perú*, 2015, p. 23.

⑥ Manuel González Prada, *Páginas Libres, Horas de Lucha*, Caracas: Biblioteca Ayacucho, 1976, pp. 45—46.

⑦ 路易斯认为印第安人与其文化应该构成秘鲁建国的民族核心,马利亚特吉则提出印第安人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具体分析大地产制和印第安人问题之间的联系;维克托·贝朗德则认为秘鲁需要认清现实,在不同的种族文化中促成融合。参见 Eugenio Chang-Rodríguez, *Pensamiento y Acción en González Prada, Mariátegui y Haya de la Torre*, Lima: Editorial de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2012.

⑧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法昆多:文明与野蛮》,史维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年版,第12—15页。

⑨ 这一计划包括在欧洲的重要城市开设办事点,通过印刷品向欧洲人宣传阿根廷政府的种种许诺,其中包括:免费的船票、一段时期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免费住宿、大量的工作机会以及前往工作地点的免费车票。有关这一时期阿根廷在欧洲的移民宣传,可以参见 Fernando Devoto, *Historia de la Inmigración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2003, pp. 214—223.

⑩ 《剑桥拉丁美洲史》中给出了1871年至1914年之间阿根廷的移民数据,为3 194 875人。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胡毓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时期内大量移民的到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各国的文化习俗,使得阿根廷显得更加欧洲化,却也淡化了阿根廷本来就不甚成熟的种种特质。^① 政治家塞瓦略斯(Zeballos)就曾感叹道:“我们将被迫成为一个年均接收50万移民的中心,总有一天我们会发觉这个国家将会变得没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征甚至自己的旗帜。”^②除此之外,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类左派思潮,也随着移民一起到达了新大陆。在诸如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下,移民群体内逐步出现了各类不同的左派工人组织。这些主要由移民群体组成的左派团体,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阿根廷政治精英期望中的“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了威胁,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大批移民所缺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外来者”和“阿根廷公民”之间的差异,使得新来移民接受阿根廷传统、融入阿根廷社会的意愿降低。^③ 最后,由于这一时期移民的数量过于庞大,甚至连移出国也觉察到了这一情况,并开始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意大利议员曼西尼(Mancini)当时便说:“从国际惯例来看,民族(nación)出现在具体的政府(estado)之前,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更能够代表一个集体。”^④意大利政府希望借重自身在拉普拉塔河流域数百万的意大利移民,将这片区域变为自己“实际掌控的海外飞地”。一种隐形的殖民倾向威胁到新生国家的主权与民族构建。

面对这种大规模移民带来的挑战,阿根廷政府尝试通过立法与行政命令,在公立学校教育、重大节日纪念与国家历史书写等各个方面发力,借助教会等各方面的力量强调阿根廷的民族特性,并希望能够加强外来移民对阿根廷身份的认同与习惯。^⑤ 与秘鲁相比,出于历史条件的差异,阿根廷在民族构建的进程中通过暴力手段比较早地解决了原住民在民族建构中的地位问题。然而虽然能够通过大规模的欧洲移民满足“白人立国”这一构想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但是立的是“谁的国”却依然是阿根廷挥之不去的一个难题。这一大规模欧洲移民给民族构建带来的冲击,实际上也影响到了同处拉普拉塔河流域的乌拉圭东岸共和国。^⑥

然而除去与阿根廷共同面对的原住民和欧洲移民问题外,乌拉圭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还面临着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在人种、语言、文化与阿根廷相似的前提下,如何构建出属于自己的“乌拉圭民族性”(Uruguayidad)。解决原住民和欧洲移民问题只是让乌拉圭更契合一个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身份,还不足以反映出“乌拉圭”本身的特性。如何塞·卡洛斯·基亚蒙特(José Carlos Chiaramonte)所写的那样:“矛盾的是,(拉美民族国家构建)的障碍并非是在文化上的差异性,恰恰相反,障碍主要是这片大陆上国家间的文化相同性太过明显。”^⑦乌拉圭历史学家赫拉尔多·卡埃塔诺(Gerardo Caetano)也认为,实际上在1850年之前,虽然蒙德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政权相异,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阿根廷和乌拉圭是相当难以区分的。^⑧ 在领土、人口和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于阿根廷的情况下,东岸的精英需要通过凸显自身

① 在这一时期的移民中,意大利和西班牙是输送第一批移民的欧洲国家。之后大量俄裔犹太人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成为了移民的主力军,混杂着来自法国、日本以及中东地区的移民。这一复杂的移民情况使得布宜诺斯艾利斯越来越像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阿根廷越来越像一个“世界主义国家”。

② Congreso Nacional, Cámara de Diputados, *Diario de Sesiones*, Octubre de 1887.

③ 阿根廷学者内斯特·托马斯·阿吾萨(Néstor Tomás Auza)就曾认为:当时新兴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更重要的给予初来乍到的各路移民一种理解、保护、团结甚至忠诚的情感集合,使得他们靠着这样一种身份,能够度过最初的过渡期。见 Néstor Tomás AUZA, “La Iglesia Argentina y la Evangelización de la Inmigración,” *Estudios Migratorios Latinoamericanos*, Vol. 14, 1990, p. 130.

④ Lilia Bertoni, *Patriotas, Cosmopolitas y Nacionalistas. La Construcción de la Nacionalidad a fines del Siglo XIX*, Buenos Aire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01, pp. 28—30.

⑤ Lilia Bertoni, *Patriotas, Cosmopolitas y Nacionalistas. La Construcción de la Nacionalidad a fines del Siglo XIX*, pp. 37—87.

⑥ Carolina González Laurino, *La Construcción de la Identidad Uruguay*, Taurus, 2001, pp. 25—42.

⑦ Jose Carlos Chiaramonte, “La Formación de los Estados Nacionales en Iberoamérica,” *Boletín del Instituto de Historia Argentina y Americana*, Tercera Serie, Num. 15, 1 Semestre de 1997, p. 162.

⑧ Gerardo Caetano, *Uruguay: Revolución, Independencia y Construcción del Estado (1808—1880)*, Montevideo: Editorial Planeta, 2013, p. 224.

的特性来避免被阿根廷所“同化”。

19世纪末的东岸精英是通过多个角度的阐释来强调乌拉圭民族性的。首先,由于该地区位于拉普拉塔河的东岸,因此从地理上就区别于位于西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此“东岸人”(Orientales)的称呼就成了该地区与阿根廷不同的一个标签。虽然该标签一开始只带有地理空间方面的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东岸人”这一概念的意涵也逐步地丰富了起来。

在这批精英们看来,“东岸”曾属于西属美洲帝国的一部分,因此与巴西帝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其次,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东岸”则在对待政体方面有着不一样的态度。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考迪罗胡安·罗萨斯(Juan Rosas)希望建立一个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政治联合体,而蒙德维的亚则选择了与拉普拉塔河联邦的其他省份一起,反抗罗萨斯的统治,并在这一过程中最终选择了独立。^①按照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包萨(Francisco Bauzá)的阐释与构建,“与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革命建立的独裁体制不同,蒙德维的亚一开始就想要通过革命建立一个共和国”。^②除此之外,东岸的政治精英也在长期的复杂斗争中对国家的定位有自己的见解。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精英们试图将阿根廷打造成西半球能与巴西甚至美国分庭抗礼的区域性大国时,他们开始将自身定位成阿根廷与巴西之间的大国缓冲中立国。^③

后续的历史学家不仅延续了上述政治精英的意图,还试图将“东岸”的历史进一步向前回溯。1880至1882年之间,包萨出版了三卷本的《西班牙在乌拉圭统治史》,第一次将该地区的传统系统地回溯到了殖民时期。在此书中,他将“查鲁阿人”等同于“原始的乌拉圭人”(原住民),并认定之前存在的“查鲁阿国”便是现今乌拉圭的前身。^④乌拉圭就是从这样一个位于东岸的独立的部族逐步演化为独立的国家的。^⑤在独立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敌人,便是那些可以被用来进一步明确“乌拉圭民族”界限的“他者”。这些“他者”包括了最初殖民的西班牙人、中间实施压迫干涉的英国人和巴西人,以及最后在政治道路上与其不同的阿根廷人(其实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⑥在东岸联合其他省份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庭抗礼的斗争中,东岸的学者开始塑造“何塞·阿蒂加斯”与“三十三名东岸人”的形象,通过学术论述和民族历史的书写,最终完成了“英雄抗击外敌,带领民族独立并建国”的民族神话。^⑦到19世纪中后期,乌拉圭这一新兴民族国家的疆域、人员、传统和神话都在上述集体阐释中大体确定,乌拉圭与阿根廷在“兄弟国家”的关系中区分出了彼此。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民族国家构建”是当时各政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但受制于各地区历史传承情形的不同,“民族国家构建”在上述不同国家中的实质内容实际上存在着差异。早期立国者的愿景与客观的历史条件一起,决定了不同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性实质:是原住民问题,还是大规模的海外移民问题,抑或是与人种文化相同的邻国问题。当然,在同一个国家中,这三项并非完全互斥,而是存在着比较复杂的联系。而要厘清各个国家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这三类问题的联系,则需要更为细致的个案研究。

(作者简介:张琨,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200444)

① Gerardo Caetano, *Uruguay: Revolución, Independencia y Construcción del Estado (1808—1880)*, pp. 32—53.

② Francisco Bauzá, *Historia de la Dominación Española en el Uruguay*, Montevideo: Librería Nacional, 1895, p. 12.

③ Gerardo Caetano, *Uruguay: Revolución, Independencia y Construcción del Estado (1808—1880)*, pp. 103—111.

④ 在论述中,他将查鲁阿国与印加帝国相提并论,见 Francisco Bauzá, “La Independencia Uruguaya,”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 Biblioteca Artigas, Vol. 145, 1975, pp. 7—8.

⑤ Carolina Gonzalez Laurino, *La Construcción de la Identidad Uruguaya*, Montevideo: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Uruguay, p. 123.

⑥ 尽管是乌拉圭人清剿了查鲁阿人,但是在编写历史教材时候,他们将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安到了西班牙人的头上,见 Carolina Gonzalez Laurino, *La Construcción de la Identidad Uruguaya*, p. 99.

⑦ 萨米恩托的《法昆多》一书将阿蒂加斯描写为一名“可怕的走私贩子”,有着“残暴的本质”和“恐怖主义的精神”,而乌拉圭的历史著作则将其描写为一名抗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雄,可参见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法昆多:文明与野蛮》,第40—41页。